

# 口述与档案:《顾维钧回忆录》成书中的 两大史料因素

高作楠

**【摘要】**1958年起,顾维钧参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项目,先后与多位学者合作,耗时近20年最终编纂完成了《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底本。这一巨著的成稿得益于顾维钧个人档案的史料支持,而在不同篇章,《顾维钧回忆录》对各类档案资料的运用情况也不尽相同。除了依托档案资料,顾维钧本人在口述采访时还透露出许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其中一部分最终在《顾维钧回忆录》定稿中得以体现,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信息仅保留在口述采访相关资料——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档案中,体现了传主顾维钧鲜明的个性。《顾维钧回忆录》、顾维钧档案以及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档案三者的综合运用,对于以顾维钧为中心的人物研究和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十分重要。

**【关键词】**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口述历史

**【作者简介】**高作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21.4.81~88

顾维钧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是近代中国对各大国关系变迁的见证人和诸多外交事件的亲历者。20世纪50年代末,顾维钧应邀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项目(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COHP)<sup>①</sup>,接受口述采访、开始回忆录编写,于1976年完成篇幅达1万多页的英文版《顾维钧口述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Vi Kyuin Wellington Koo)。1983年起,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中译本《顾维钧回忆录》13册,顾维钧及其外交生涯成为近代史研究持续不断的关切对象,该书的史料学价值甚至史料属性亦被高度肯定,学者赞之为“一部可信度较高的、具有一定的资料长编性质的回忆录”<sup>②</sup>;另一方面,学界也较早注意到《顾维钧回忆录》与哥大口述历史项目的关系,对此虽然不乏介绍性文章,包括流传甚广的口述工作参与者的回忆<sup>③</sup>,但这些内容的客观性也需要进一步论证。

笔者认为,对中译本《顾维钧回忆录》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回答其能否作为叙事立论依据的史料而直接征引的问题,需要从考察其英文底本的完成

过程入手,考订并还原顾维钧与中国口述历史项目关系的基本方面,揭示《顾维钧回忆录》与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档案和与顾维钧个人档案的关系,进而讨论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叙事模式的口述史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

## 一、《顾维钧回忆录》英文底本的形成过程

中译本《顾维钧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翻译自《顾维钧口述回忆录》,后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项目完成的16部口述传记中,用时最长、篇幅最大的一部。长期以来,这部口述传记是如何完成从采访、口述、编写、定稿全过程的,学界并无专门研究。《回忆录》第一分册的“出版说明”仅有寥寥几句介绍:“这一巨著是顾维钧博士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共同合作的成果。该院先后有五位学者根据顾氏口述,并利用他保存多年的日记、会务纪要、电报档案及信函、文件,经录音、编写、核实、校正,历时十七年之久,始得完成这部回忆录。”<sup>④</sup>除此之外,陆续问世的各册中译本《回忆录》均未提及参加顾维钧口述工作的各位学者。

根据《回忆录》第十三分册附录“顾维钧生平简介”，顾是“196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口述历史计划主任韦慕庭约，开始其《回忆录》工作”的<sup>⑤</sup>。另一方面，参加中国口述历史项目的学者唐德刚也断言“顾维钧先生在1960年初有意参加我们‘口述历史学部’”<sup>⑥</sup>，因此，不少学者都采信了这一说法。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该项目开始的时间应当是1958年<sup>⑦</sup>。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档案(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Collection)的记载，顾维钧与哥大东亚研究所口述历史项目的合作始于1958年，时在美国的胡适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是年2月间，胡适得知顾已经着手准备回忆录事宜后，便建议韦慕庭直接联络顾本人；韦氏遂于1958年2月14日致函顾维钧介绍该项目并邀请顾面谈<sup>⑧</sup>。对此顾维钧给予了积极正面的回应<sup>⑨</sup>。于是，顾维钧很快就与韦慕庭及口述历史项目其他成员建立联系，进一步交换看法。

在确定参与哥大口述史项目之前，顾维钧与韦慕庭的学生夏连荫几度会面沟通。夏连荫向顾维钧介绍了口述史的基本概念和技术问题，强调哥大东亚研究所正努力将口述历史的方法运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sup>⑩</sup>。1958年4月底，他便答应原则上接受参加中国口述历史项目的邀请<sup>⑪</sup>。从哥大东亚研究所与顾维钧取得联系，到顾确定参与中国口述历史项目，前后仅用两个月左右时间。

《回忆录》的作者除了传主之外，还包括哥大口述历史项目安排的采访和编辑人员。中译本《回忆录》的“出版说明”提到过哥大安排过五位学者，但并未给出具体姓名。而据唐德刚回忆，口述工作人员还有夏连荫、“哥伦比亚大学的曹博士”、一位“叫乔治·西蒙尔”的美国人、“一位整理材料的美国小姐”<sup>⑫</sup>。近年来，有研究者明确提出这五位人士为：夏连荫(Julie Lien-Ying How)、苏堂栋(Donald Sutton)、唐德刚(T. K. Tong)、克里斯特尔·赛德曼(Crystal Seidman)、司马晋(Jim Seymour)<sup>⑬</sup>。其中，赛德曼应即唐提到的“整理材料的美国小姐”，司马晋即为乔治·西蒙尔。事实上，除了这五位工作人员外，还有一位 Kai-fu Tsao 博士(即“曹博士”)亦参加了采访和编辑文本工作。换言之，共六人直接参加了有关顾维钧口述回忆录的工作，他们都是受过史学训练的专业人士。

据下表可知，顾维钧参与中国口述历史项目合作步入第九年，但完成编辑的稿件仅有前三卷，总计篇幅不大。而顾维钧几次重要的出使经历还大多停留在采访、整理录音稿阶段，未能编辑成稿，特别是关于抗战胜利后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时期的采访才处于起步阶段。而已完成的前三卷回忆录是以受访人顾维钧的回忆为基础，辅之以参与口述工作的学者的考证、编辑完成的<sup>⑭</sup>。

1967年顾维钧退休后定居纽约，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哥大口述项目，此时赛德曼女士全职负责采访和编辑工作。赛德曼在回顾这段工作时谈到，顾

1958年至1966年各人具体承担相关工作情况表

卷号/中译本册数	主题	时段	已完成整理的录音及录音稿情况/负责人	第一次编辑稿/负责人
I/第一分册	童年及求学时代	1888-1912	完成/夏连荫(其中29页由顾维钧撰写)	已完成, 143页/夏连荫
II/第一分册	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1912-1922	已完成/夏连荫(1921-1922年部分由唐德刚完成)	已完成295页/苏堂栋
III/第一分册	回国任职	1922-1932	已完成/唐德刚	已完成365页/苏堂栋
IV/第二、三、四分册	出使法国	1932-1941	完成60%计308页/唐德刚(四次采访)、司马晋	0
V/第五分册	二度使英	1941-1946	完成90%计1348页/Kai-fu Tsao、司马晋	完成80%计900页
VI/第六分册	再度出使华盛顿	1946-1956	完成15%计510页/司马晋	0

参考资料:《关于顾维钧参与中国口述历史项目的进展》(On the V. K. Wellington Koo Project of 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日期不详, COHP, 第15盒, 文件夹1。

维钧在口述访谈中“更倾向于使用准确的文字记录而非依靠记忆”，“一开始我们主要是用会谈记录和日记……我也注重利用其中保存的电报。”最初，两人按时间顺序进行访谈，但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以专题的模式进行。采访前，顾维钧会事先看相关时段的日记和会谈记录；见面后，他会简要介绍这次访谈的主题，并选择性地读一些日记或会谈记录<sup>⑮</sup>。这种工作方法决定了有大量史实细节需要处理，因此工作节奏也相对缓慢。

总体来说，口述工作的基本流程是：顾维钧接受采访并录音，采访结束后由专门的打字员根据录音整理成原始稿件，交给顾维钧和采访人审阅修改；双方达成一致后，编辑者再根据修改版草拟成文，并用方括号注明哪些内容是原始采访记录和编辑者记录中都没有提到的内容、哪些不是顾维钧直接引述的语句、哪些是有出处但高度概括和精炼的语句，以及编辑者就具体内容向顾维钧的提问，从而形成第一次编辑稿。这一稿本会交给顾维钧修改审核，由他判断方括号内的内容是否准确地反映了他的观点。顾完成对第一次编辑稿的修改补充后，形成最终文本的底稿<sup>⑯</sup>。截至1975年下半年，回忆录的编辑工作基本完成，已编辑口述稿10436页，未编辑稿680页<sup>⑰</sup>。

## 二、多种史料在《顾维钧回忆录》中的运用

顾维钧开始接受采访后不久的1959年初，韦慕庭获悉顾氏有意将其保存多年的个人文件捐给哥大图书馆，便立即写信给馆长洛格斯登(Richard Logsdon)，认为馆方应当采取措施落实，因为这些档案对于中国近代史非常重要，能够产生数篇博士论文，并为正在进行中的回忆录工作提供有力支撑。随后韦氏又致函哥大校长柯克(Grayson Kirk)，再次强调顾档对于中国近代史、近代外交史甚至美国史的重要意义，“据悉这些档案内容非常丰富……包括1922年以来他(顾)出任任上与各国政要的谈话记录、与中国外交部的往来函电以及多年来的日记。一位中国外交家保存着如此丰富的资料，是非常罕见的”<sup>⑱</sup>。此后，哥大图书馆方面积极筹备空间，为数量庞大的顾维钧档案提供良好的储藏、整理条件，最终促成顾维钧将其个人保存的档案赠予哥伦比亚大学。捐赠完

成后，顾维钧表示，为进一步丰富他的口述回忆录，希望哥伦比亚大学能尽快开始其个人档案的整理工作<sup>⑲</sup>。顾维钧档案的捐赠和整理，对此后的顾维钧口述采访及回忆录的撰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维钧曾说过：“对三十年代初以前的那段历史，我手头上没有任何可以查阅的原件，只能主要靠我的记忆。”<sup>⑳</sup>顾所说的“三十年代初以前的那段历史”对应的是中译本《回忆录》第一分册，而据相关档案资料显示，该部分成稿，除了少部分内容完全依靠顾的个人回忆，大部分内容仍有相当数量参考资料作为撰写依据，参与口述工作的学者依据史料在顾维钧口述的基础上做出了科学的考订。

顾维钧个人档案中保存有一份关于回忆早年的英文手稿，题名为Memoirs Early Childhood，成稿日期为1958年6月27日，在顾维钧确定参加中国口述历史项目前即已完成。这份手稿的内容基本为中译本《回忆录》第一分册中第一卷的前五节以及第六节的开头部分，只少量删减了顾维钧对儿时游戏、消遣娱乐的具体描述。这部分早年经历是顾维钧的追忆补记，并无档案依据。

顾维钧最初几次采访主题都是围绕他的留学生活展开的。采访人夏连荫汇总顾维钧自己认为不清、不确之处，以及采访中发现的疑问，设法查阅哥大大学籍档案、校友簿、教职工名册等各种资料，并把核实结果反馈给受访人。如顾维钧起初不能确定留美中国学生就对日问题致电北京政府的日期，是夏连荫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第7卷第1期(1911年11月)中找到了相关信息。甚至顾维钧在哥大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也是夏连荫在哥大图书馆查得该篇论文之后，才得以认定的<sup>㉑</sup>。以上查核结果均为《回忆录》定稿所采用<sup>㉒</sup>。因此可以认为，《回忆录》中关于顾维钧的留美生活，系以顾口述为基础，夏连荫对主要史实尽可能地进行了查核后撰写完成的。

关于《回忆录》第一分册中的其他部分即“担任外交官头十年”和“回国任职”，尽管缺少个人文件和日记，但顾维钧及采访人针对这段职业经历准备了资料。夏连荫在哥大图书馆和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多方查找这一时段的主要出版物目录，包括《政府公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申报》《北华捷报》《密勒

氏评论报》等报刊<sup>⑧</sup>。在这些出版品中,可以较容易地找到关于民国初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主要外交事件的基本报道和分析。

此外,顾维钧曾与资深外交官金问泗多次交流有关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史实和看法。1958年3月,金问泗把《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一文发给顾维钧,该稿是金一年前受到顾维钧的启发开始撰写的。这个稿子后来整合到金问泗1959年3月17日完成的《威尔逊、顾维钧和巴黎和会上的中国问题》一文中<sup>⑨</sup>。而关于华盛顿会议的相关情况,1960年年底至1961年,顾维钧与金问泗频繁通信,核定金撰写的有关华盛顿会议的文稿。最后成稿《中国在华盛顿会议1921-22》,该文引用了大量中美双方原始资料如美国外交文件、国会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藏外交档案以及部分报刊报道<sup>⑩</sup>。通过与金问泗的互动,可以认为顾维钧对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资料及具体历史情况已有相当程度把握。

此外,顾维钧与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袁同礼取得联系,请后者帮助查找和复制了多份报刊资料。顾维钧专门致函袁表示感谢,称这些资料有助于他回忆起30多年前的往事<sup>⑪</sup>。这些资料涵盖了《回忆录》第一分册第二卷、第三卷时段,涉及诸多重要案例,无疑对顾维钧口述采访及文稿编辑,有着重要的参阅价值。虽然《回忆录》没有大量直接引述这些档案资料,但可以推断顾维钧获得并阅读这些文件,为其口述的历史客观性起到了保证作用。

当访谈内容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顾维钧档案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负责采访和编辑的赛德曼认为,正是“得益于顾档的丰富性,我们的口述工作质量很高,受访者的回忆可以得到史料的佐证”<sup>⑫</sup>。然而在记述一项复杂的历史事件时,限于口述工作的时效,《回忆录》定稿往往只选取顾档中的部分资料,造成叙事上的截断,未能展现事实全貌。

以战后美援交涉为例,中译本《回忆录》第六分册中“为援华计划而奋斗”一章展现了顾氏参与1948年《援华法案》交涉的过程,依据的资料主要是顾维钧与美方人士的会谈记录及顾个人日记。但其内容又过于详细分散,近乎琐碎而无重点,作为史料来说

则完整性有所欠缺。《回忆录》中记载了一段法案通过后国民政府技术代表团与美国国务院官员的重要会面,讨论如何具体开展法案规定的经济援助,其中提到中美暂以“草约”的形式签订协议<sup>⑬</sup>。这一段描述正是基于1948年4月8日顾维钧日记所记内容,所谓“草约”,原文为“letter of intent”<sup>⑭</sup>,笔者认为此处译成“草约”语义欠准确,译成“意向书”较妥帖,意向书大多是信件格式,是谈判双方交换意见的一种文件形式,符合实际讨论的文本特征。除了日记中的记录,顾维钧等人致电政府详细汇报了商谈的内容。该电明确提出中方应反对以意向书的形式签约,因为国务院所提意向书内容过于宽泛,不利于正式协议的达成<sup>⑮</sup>。而这一点并未在《回忆录》中得到体现。处于主动地位的美方坚持以这种方式交换意见,拟好意向书并送达驻美大使馆。顾维钧等人研究其内容后立即电告外交部。关于这封电报的内容,《回忆录》中只写道:“国务院仍坚持以1947年10月27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结束后的援助协议作为扩大新援助的基础,但可以有某些尚待商定的特殊例外和修正。”<sup>⑯</sup>此外《回忆录》就经济援助的意向书问题再无说明。实际上该电副本保存在顾档中,电文附列了意向书全文并草拟了中方回复。在另外一封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的电报中,顾氏等人还详述对该意向书的看法以及对上封电文中草拟回复的说明<sup>⑰</sup>。4月20日,外交部回电,决定采纳顾维钧、贝祖诒(时任驻美技术代表团团长)意见,并请两人尽速完成交换意向书<sup>⑱</sup>。至此,签订经济援助意向书一事才尘埃落定。

通过上述一例,可以看出中译版《回忆录》翻译自英文,其中难免存在瑕疵和错误;更重要的是,《回忆录》本身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有时是单向的,不能提供完整的详细信息。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顾维钧档案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关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藏档数量多而分散;而另一方面,中国口述历史项目受限于时间和经费,在采访和编撰时只挑选了部分资料使用。因此,研究者在利用《回忆录》时,应当特别注意顾维钧档案中的相关资料。

### 三、顾维钧口述采访中的未尽之言

如上所述,《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底本是哥大

中国口述历史项目的成果,这一底本从采访到编辑定稿的过程和不同阶段的稿本,都保留在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档案中。此外,这项馆藏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原始采访稿以及大量副产品如采访人说明、编辑资料、机密未录音记录等文件。这些文件揭示了顾维钧在口述访谈中谈到、但公开出版的中译本《回忆录》较少提及甚至回避的内容。

### 1. 对政治人物的看法

在口述采访中,当顾维钧被问及他与王正廷的不同,顾直截了当地说:“王先生主要是个政客,王政治兴趣浓厚,肯刻奔走,善词令,有政治魄力”,但是王“所叙诸事,错误百出,张冠李戴,有时时间前后相错十多年”,并细数王正廷在外交工作中的种种失误:巴黎和会时逼迫陆征祥;《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字之际犯下的错误;中比条约期满时,顾维钧主张在新约中应该取消治外法权遭到比方抗议,但随后比方不再强硬、眼看有转机之时,王“竟签字于允许治外法权之中比新约,致遭立法院院长之大骂”<sup>⑧</sup>。《回忆录》中也记载了上述中苏复交谈判、中比新约谈判二事和其中顾王的分歧,但是偏重叙述事实,措辞仍较克制(“王正廷是个很能干的人物,当然他在外交方面不曾受过任何特殊训练”)<sup>⑨</sup>,并未使用“错误百出、张冠李戴”这样严厉的指责。

又如,顾维钧对抗战后期驻美大使魏道明的态度。1944年顾维钧赴美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注意到彼时美国报端对中国的批评。他建议魏道明向重庆汇报此事。但魏拒绝了这项建议,不过他表示不介意顾这么做。于是顾斟酌后致电蒋介石,建议政府采取措施改善美国对中国的印象。但是他未能收到蒋的回电<sup>⑩</sup>。《回忆录》中也提到了他与魏道明的分歧:“我认为魏大使应该向重庆汇报美国报纸报道的内容……魏大使对我说,这样做毫无作用,而且也不会得到赏识……他建议由我电告委员长。我说,既然他是大使,我不想干预他的事情。”<sup>⑪</sup>《回忆录》写到这里戛然而止,似乎仅仅是叙述了一件事。但实际上在口述访谈中顾维钧流露出更明显的不赞同态度。当采访人问到如何看待魏道明调离驻美大使之职,顾便从魏的就任谈起,透露促成魏道明出使华府的关键人物是熊式辉,两人是江西同乡,在日本留

学时还是同学。然而顾维钧指出这一任命的隐忧:驻美大使一职往往都由留美学生担任,但魏道明却并无任何美国教育背景;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良好运行至关重要,但在关键时刻双方却产生了误解,顾氏认为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的驻美大使并不了解美国,而魏道明不愿提醒国内注意美国舆论动向一事便证明了这一点<sup>⑫</sup>。显然,顾维钧对魏道明的行事是非常不以为然的,认为他的不专业性加剧了当时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权关系的波折。但是这种判断并未在《回忆录》中得到体现。

### 2. 与国民党的距离

顾维钧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本人亦是国民党党员。但是,《回忆录》中并无关于顾氏何时、何地、由何人介绍加入国民党的记载,只是在第五分册中简略提及“(1941年就任驻英大使)我于次年才成为国民党党员”<sup>⑬</sup>。有学者据此认为,顾维钧没有在自己的《回忆里》中着重记述这件事,说明“他对此是羞于启口的”<sup>⑭</sup>。实际上,在访谈中顾维钧被多次问及他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他对此直言不讳,并将自己与国民党的渊源追溯到1912年:当年刚刚加入北京政府的他在唐绍仪的建议下,加入了同盟会。次年,伴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以同盟会为主体的国民党四分五裂,供职北京政府的顾维钧和国民党的关系渐行渐远。1931年蒋介石邀请顾氏到南京商讨“满洲问题”,顾成为国民党中央会特种外交委员会的一员。当时陈果夫曾想动员顾维钧入党,甚至完成了所有表格手续,只需要后者签字。但顾维钧只答应“会考虑”,结果不了了之。1942年10月至次年3月间,顾维钧在驻英大使任上回国,一方面协助接待英国国会访华团,一方面与政府高层就中英关系问题交换意见。期间他又受到了入党的压力<sup>⑮</sup>。于是,在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的介绍下,他最终加入了国民党<sup>⑯</sup>。虽说加入国民党,甚至后来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sup>⑰</sup>,顾维钧却自认为不是一个积极的党员。1946年3月他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了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会,但是并未实质参与<sup>⑱</sup>。在后来的口述采访中,他表示对这种橡皮图章般的会议感到厌烦<sup>⑲</sup>。顾氏在访谈中对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并

不避讳,只是这些更能体现顾维钧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真实看法的内容,并没有收入《回忆录》定稿。

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覆亡后,顾维钧选择继续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究其原因,有学者在阅读《回忆录》之后得出如下结论:“所有的人都面对这样的局面,国共之间,必居其一,在没有第三种选择的情况下,顾氏选择了国民党……因为他们对于共产党有着一种本能的恐惧感。”<sup>④</sup>然而这一判断只能说是一种推论。实际上,在口述采访中顾维钧曾被问及:“尽管不赞同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制,但你是否继续保持对该政府的忠诚,这是因为唯一的另一选择只能是共产党,而后者绝无考虑的可能,是吗?”他明确回复:“不是。”他强调:“无论是什么党派,我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在顾看来,所谓“倒向”国民党,与其说是一种政治选择,不如说一种情感倾向和对自己名誉的维护:“我不愿意离开一艘将沉之船,世人会议论纷纷:‘看吧,顾维钧也离开了’,这是我不能忍受的。”<sup>⑤</sup>

### 3. 个人家庭生活

除了《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较详细谈到过顾氏早年的家庭、婚姻外,后来各册基本上不再涉及他的个人生活。采访人曾向顾氏提出希望他多谈谈第三位太太黄蕙兰,顾维钧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想要避免人身攻击<sup>⑥</sup>,夫妻关系不睦可见一斑。在口述访谈时,顾维钧提到过在1920年代初期他与黄蕙兰在北京的生活情况,其中有部分内容最后被写入《回忆录》正义,但是删去了部分对黄蕙兰奢侈生活的描述<sup>⑦</sup>。顾维钧卸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一职后不久,与黄蕙兰最终离异,《回忆录》中未提及原因。然而在口述访谈中,他作了回答:“黄乃富家女,是被惯坏的孩子,其对交际应酬各国使节贵妇很为内行,对于理财治家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这也难怪她,她一直被人服侍,从未服侍人。”在顾维钧眼中,黄蕙兰并不具备他所认为的妻子应当有的条件,他甚至认为黄与之结婚只是为了享受各种交际的场合。虽然两人不是合拍的伴侣,但却保持了长期的婚姻关系,其原因在于顾维钧认为服务公职期间,大使离婚是一件丑闻,将有损国家体面<sup>⑧</sup>。

在《回忆录》中,顾维钧用不少篇幅回顾自己的

童年生活,但很少提到自己出生的家庭,他甚至对采访人说这是因为“我并不觉得那(家庭)很重要”,让后者惊讶不已。因为顾母身体不好,顾维钧小时候长期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对后者有很深的孺慕之情。而在自己的兄弟姐妹中,他则与姐姐的关系最好。另一面,父亲对顾维钧而言,则是一个疏远的存在,顾父并不常伴在孩子身边。这样的相处模式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顾维钧自己的家庭关系,他曾承认“父亲与我的关系大概就像我和我自己的孩子的关系”<sup>⑨</sup>。

综上,顾维钧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许多当时的他不希望《回忆录》终稿中提及的内容(顾本人及相关当事人均在世)。这些内容中的一小部分,在征得顾维钧认可后,经过编辑最后还是写入了《回忆录》,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仅留存在口述历史项目档案中,有待研究者发掘和利用。与以公文为主的顾维钧档案相比,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档案顾维钧部分个人特色浓厚,处处体现了顾维钧的“个性”。史学研究者若能将两者结合,细心爬梳,当能还原更趋向真实的、既是外交家义是普通人的顾维钧形象。

### 四、余论

回顾《顾维钧回忆录》的诞生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档案开放情况,不难看出口述史工作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哥大中国口述历史项目团队与受访人的密切合作,得以将《顾维钧回忆录》这部巨著介绍给学界,推动了顾维钧为中心的民国人物研究乃至民国外交史研究。

长久以来,学界对口述历史相关资料的史料价值持较为审慎的态度。就历史研究对口述历史成果的运用而言,有观点认为在根据文本再研究的经典历史研究模式下,学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根据口述史文本做研究;而这类口述史文本再研究,实际上看到的是剪裁过的文本,口述史文本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往往不会公开表达出来<sup>⑩</sup>。口述历史成果的价值与其形成过程和工作方式息息相关。一项口述史成果如果仅仅依靠受访人个人事后回忆,口述工作者也只做机械的记录工作,那么以这种方式撰写而成的文本,其史料价值自然是有限的。应当说明的是,口述史成果与传统的档案史料并不是截然分

开的,优质的口述史成果结合了档案资料的支撑以及专业学者对受访人“口述”的核实与考订。

《顾维钧回忆录》是顾维钧本人与专业学术团队以口述采访的形式,综合运用多种档案资料特别是在顾维钧个人档案的基础上完成的,其自身的“形成史”也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哥大图书馆藏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档案记载了对顾维钧开展口述采访和后续工作的经纬,一定程度上可以还原当年顾维钧接受采访时的情况。采访过程中谈到但未收入《回忆录》定稿的内容,也大多保存在口述历史项目档案中,可以说这一馆藏披露了过往鲜为人知的信息,反映了口述历史项目的参加者与受访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深化受访人相关史事以及受访人与中国口述历史项目合作过程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档案仍待研究者们进一步的挖掘,特别是关于口述成果形成史和口述受访人个人研究,该馆藏可能会提供新的发现和突破口。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档案与顾维钧档案,是《回忆录》成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大史料因素,也是全面评价《回忆录》时应当予以充分掌握的。

#### 注释:

①学界对“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有多种翻译,如“中国口述历史计划”“中国口述历史项目”“中国口述历史工程”等,本文统一采用“中国口述历史项目”译法。

②邓野:《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185页。

③参见何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管窥》,《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1期,第85~89页;沈潜:《〈顾维钧回忆录〉的成稿与出版》,《文史精华》2002年5月,总144期,第53~56页;唐德刚关于参与《顾维钧回忆录》撰写工作有两篇个人回忆性文章,分别为《〈顾维钧回忆录〉的撰写秘史》《广陵散从此绝矣——敬悼顾维钧先生》,收录于唐德刚:《史学与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以下该书各册均同版,不复注出,特说明。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3分册,第313页。

⑥唐德刚:《史学与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91页。

⑦参见杨大辛:《〈顾维钧回忆录〉的缩编工程》,《津图学刊》1995年第3期,第70页;沈潜:《〈顾维钧回忆录〉的成稿与出版》,《文史精华》2002年5月,总144期,第53页;赵庆云:《〈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风波》,《读书》2016年第1期,第157页。以上文章均持顾维钧参加口述历史工作始于1960年说。而认为顾自1958年开始口述历史项目的,参见何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管窥》,《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1期,第88页。

⑧《韦慕庭致顾维钧函》(1958年2月14日),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馆藏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档案(下文凡引该档案,简称COPH),第14盒,文件夹1。

⑨《顾维钧致韦慕庭函》(1958年3月8日),COPH,第14盒,文件夹1。

⑩《与顾维钧博士的午餐会》(1958年3月25日),COPH,第14盒,文件夹1。

⑪《顾维钧致夏连荫函》(1958年4月30日),COPH,第14盒,文件夹1。

⑫唐德刚:《史学与文学》,第88~89页。

⑬王成志、陈肃、王晓燕:《北美藏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档案文献提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

⑭⑮《顾维钧口述回忆录·序言》(Preface, Reminiscences of Vi Kyuin Wellington Koo)第1卷,第2、4~6页。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馆藏。

⑯《关于顾维钧口述回忆录的说明》(Explanatory notes of the reminiscences of Wellington Koo),日期不详,COHP,第15盒,文件夹1。

⑰《关于顾维钧参与中国口述历史项目的进展》(On the V. K. Wellington Koo Project of 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日期不详,COHP,第15盒,文件夹1。

⑱《韦慕庭致柯克函》(1961年9月7日),COHP,第14盒,文件夹1。

⑲《Kai-fu Tsao致何廉、韦慕庭函》(1964年2月14日),COHP,第14盒,文件夹1。

⑳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附言》第1分册,第1、62、65页。

㉒《夏连荫致顾维钧备忘录》(1958年10月6日),COHP,第14盒,文件夹1。

㉓《夏连荫致顾维钧博士备忘录》(1958年6月3日),COHP,第14盒,文件夹1。

㉔《顾维钧在巴黎和会》(Dr. Wellington Koo at the First Peace Conference in Paris)(1958年3月7日);《威尔逊、顾维钧与巴黎和会上的中国问题》(Woodrow Wilson, Wellington Koo and the China Question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1959年3月13日),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馆藏顾维钧档案,第1a盒,

文件夹3。

⑲《中国在华盛顿会议 1921-1922》(China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in 1921-1922), 日期不详, 顾维钧档案, 第1a盒, 文件夹5。

⑳《顾维钧致袁同礼函》(1961年3月21日), 顾维钧档案, 第1盒, 文件夹“个人回忆录2”。

㉑“序言”, 《顾维钧口述回忆录》(Preface, Reminiscences of Vi Kyuin Wellington Koo)第1卷, 第5~6页。

㉒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 第311、314页。

㉓《顾维钧日记》, 1948年4月8日, 顾维钧档案, 第217盒。

㉔《贝祖诒致张群、张嘉璈电》(1948年4月7日), 顾维钧档案, 第156盒, 文件夹R6。

㉕《顾维钧、贝祖诒致王世杰电》(1948年4月18日), 顾维钧档案, 第156盒, 文件夹R6。

㉖《外交部致顾维钧、贝祖诒电》(1948年4月20日), 顾维钧档案, 第156盒, 文件夹R6。

㉗《顾维钧博士谈话记录》(二)(1966年11月26日), COHP, 第15盒, 文件夹3。

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 第319、342页。

㉙⑳《未录音顾博士言论》(1964年12月17日), COHP, 第72盒, 文件夹6。

㉚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 第406~407、4页。

㉛邓野:《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第208页。

㉜《未录音顾博士言论》(1966年2月10日), COHP, 第72盒, 文件夹6。

㉝《第三次采访顾博士》(1958年7月18日), COHP, 第15盒, 文件夹2。

㉞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第979页。

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 第614页。《回忆录》原文未明确记载具体会议名称, 通过会期可知, 他出席的是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㊱《未录音评论:顾维钧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Note on off record comments on Wellington Koo's relationship to the KMT gov.)(1968年2月12日), COHP, 第72盒, 文件夹3。

㊲邓野:《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第210~211页。

㊳《关于国民党政府》(On the behavior of the KMT Govt.), COHP, 第72盒, 文件夹3。

㊴《未录音顾博士言论》(1964年12月1日), COHP, 第72盒, 文件夹6。

㊵《关于北平生活与黄蕙兰的奢侈》(Comments on(1) Life in Peking,(2)Koo Hui-lan's extravagance), COHP, 第72盒, 文件夹3。

㊶《顾维钧博士谈话录(四)》(1970年5月2日), COHP, 第15盒, 文件夹3。

㊷《采访记录》(1974年2月26日), COHP, 第72盒, 文件夹3。

㊸钱茂伟:《作为活人历史研究的口述史》,《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第114页。

## Oral History and Archives: Two Major Historical Collections in the Compilation of

### *Reminiscences of Vi Kyuin Wellington Koo*

Gao Zuonan

**Abstract:** Since 1958, Wellington Koo had cooperated with several scholars in the China Oral History Projec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for nearly 20 years, and finalized his memoirs, *Reminiscences of Vi Kyuin Wellington Koo*. The masterpiece was backed up by Koo's personal papers, while the use of various archival document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memoirs varied. In addition to relying on archival materials, Koo himself revealed many vivid historical details during the interviews, some of which were eventually written in the final draft of the memoirs, but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information which reflected the distinct personality of Wellington Koo, was still retained in the working papers related to the oral interviews—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Collection. The combined use of *Reminiscences of Vi Kyuin Wellington Koo*, Wellington Koo Papers and 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Collection, is therefore crucial to the study of Wellington Koo himself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

**Key words:** Wellington Koo; *Reminiscences of Vi Kyuin Wellington Koo*; Oral History